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谭嗣同



在绿色掩映的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矗立着一幢华表，华表上镌刻着几行遒劲的大字：

亘古不腐，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

原来这里长眠着一位在近代中国史上叱咤风云的杰出人物——谭嗣同。华表上的诗句正是后人对这位变法运动勇士的景仰和追念。

一、少年壮志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华相众生、东海寰（qian）冥氏。他的祖辈从明朝末年起定居湖南浏阳，世代为官。祖父谭学琴，是清朝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父亲谭继洵（x*n），在进士考试中遥遥领先，获得一甲第二名（俗称榜眼），因此担任了户部主事，后升任户部郎中。父亲 37 岁那年（1865 年），谭嗣同出生在北京宣武门外澜（l2n）眠胡同一座大宅第中。这个小生命的诞生，给谭家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然而，谭嗣同却生不逢时，大清王朝康熙乾隆时期的太平盛世景象，到这时已荡然无存，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却接踵而来，从士绅到百姓，他们都感到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经历了两次列强大规模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后，创深痛巨的中国士绅对世界仍然一无所知。他们还不知晓，在 19 世纪上半叶，英国等列强，陆续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巨大成果不仅产生了使用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大工厂，而且，他们把根本改变生产手段的蒸气机装在了用于海外殖民的军舰上，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生产的后膛装弹的来复枪装备了殖民军队。在工商业资本家疯狂的怂恿下，列强凭着坚船利炮，开辟了一片又一片的殖民地，不断地掠夺殖民地的财富，又不断地向殖民地倾销商品。从 1840 年起，中国成为列强重要的侵略和掠夺对象。屈辱悲愤的历史便从此开始：割地、赔款、开辟通商口岸和租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准许通商口岸停靠外国军舰、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并建造教堂。列强的侵略使清王朝本来就已经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愈益加剧：天灾人祸频仍，全国各地的灾民人数在急剧增加；洋布滚滚而来，使原来以纺织为业的人失去了生活来源；为了支付数额巨大的赔款和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开支，清政府不断增加捐税种类，提高税额；与此同时，各级官吏肆意欺诈百姓，巧取豪夺……清王朝的残暴统治迫使贫困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反抗清政府专制统治的斗争在这一时期此伏彼起。谭嗣同从小就耳闻目睹了这一切，社会动荡不安、民族的屈辱和百姓的苦难在他的心灵里打上了烙印。

少年时期的谭嗣同聪颖好学。5 岁时，他在北京开始读书。时间不长，他就能准确地分辨四声，与人应对作诗。他不用教师督促，自觉地把所学的内容全都背诵下来。8 岁那年，由于疲劳过度，嗓子不能发出声音，像撕肝裂胆一样疼痛难忍。可是，他依然如故，起早贪黑地读书。母亲从浏阳老家归来听说了这件事，既心疼孩子，又为孩子的作为感到欣慰。她笑着对家人说：“这个孩子倔强，能自立自强，我死了以后，可以不必担忧了。”

10 岁，谭嗣同拜欧阳中鹄（h*）为师，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籍。欧阳教师不仅有渊博的知识，而且还具有忧国忧民、改革时政的进步思想，这些对谭嗣同的成长起了重要的作用。和所有的官宦家庭一样，父亲希望嗣同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然而，谭嗣同的志向却不在这里，他在课本上写了“岂有此理”4 个字，并且批评科举考试对国计民生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使人皓首于八股文。在欧阳教师的熏陶下，他好学深思，善于从先秦经学、诸子、宋明理学和清代诸家的学说中吸收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内容。他向往能经国济世、学以致用之学问。明朝末年王夫之、黄宗羲对儒家思想和封建制度的批判精神和清朝中期龚自珍、魏源所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对谭嗣同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他如饥似渴地钻研他们的著作，希望有一天能实现改造中国

的宏伟志向。

要一展宏图，必须要有勇猛顽强的精神和技艺超群的武艺。谭嗣同专门请蜚声京内外的武林高手大刀王五传授击剑术。大刀王五早年曾在直隶（河北）、河南、陕西和甘肃一带杀富济贫、扶弱锄强，人们称他是“义侠”。谭嗣同钦佩大刀王五为民解难的仗义之举，决意为了国事而练武强身。

12岁那年，北京城内外流行瘟疫。谭嗣同的母亲、姐姐和哥哥3人相继去世。他自己也被传染，一直昏死3天才醒来。经过这场灾难，谭嗣同痛失3位亲人，他忍受了骨肉离别的痛苦。然而，母亲尸骨未寒，谭嗣同又遭受了庶（sh）母的歧视和虐待。他痛苦万分，走投无路，几次被推到死亡的边缘。处于这样艰难困苦的生活中，他感悟到生命是那样的微小，不过是具躯壳。但是，除了让这一躯壳为了别人而存在之外，又有什么可惜的呢？他崇拜墨子的“兼爱”、“任侠”和“摩顶放踵”的精神境界，要不分亲疏远近地爱别人，用自己的力量舍死忘生地去帮助别人，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即使自己全身从头到脚被消磨掉也心甘情愿地去做。

1883年，谭嗣同跟随父亲赴兰州任所。在西北边寨广袤（mào）的原野上和层峦叠嶂的山峰中，他尽情地跃马驰骋。壮丽的河山开阔了他的胸怀，更激起了他对祖国锦绣山河的热爱。各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民的疾苦使他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和认识。第二年，法国军队侵犯滇闽，中法战争爆发，清政府在战场和外交上首鼠两端。对此，谭嗣同不能理解，感到十分困惑。为了探索一条改变中国现状，而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驾齐驱的途径，他开始漫游各地，结交同志，访求民情。在长达十年的漫长旅途中，他的足迹遍及直隶、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台湾等省，耳闻目睹了民不聊生，路有饿殍（pǐ3o）的惨景。因而，谭嗣同发出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哀叹。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但是，清政府一意妥协投降，致使中国军队遭到惨败。听到这一噩耗，谭嗣同奋笔写了愤怒的诗篇：

世间无物抵春愁，
合向卷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
天涯何处是神州。

这首诗的大意是：人们说“春愁最愁人”，可是当前的民族危机，就是最大的春愁。它给我增加了无限的痛苦，这痛苦折磨着我，我应该向着苍天，痛哭一场，一泄我久积在胸中的愤懑（m7n）。这不只是我一人这样，民族危亡，使四万万中国人都一齐流下悲痛的泪水，我遥望天边，痛苦地思索：理想的中国在哪里呀？

1895年3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中国被迫赔偿军费2亿两白银，将台湾、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举国哀痛。从爱国士绅到普通民众都切齿扼（6）腕，痛恨卖国贼把民族国家的利益视同儿戏，一些在北京的台湾省籍人不禁失声痛哭。时在浏阳的谭嗣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人独自在房内彷徨，痛定思痛。

当时，正值全国各地的举人在北京参加进士考试。广东举人康有为邀集应试的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皇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因举人进京考试乘坐公家提供的车马，所以称这次上书为“公车上书”。虽然，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签为由，拒绝接受“公车上书”，但上书被

广泛传抄和刊印，从此揭开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

这时远在湖南的谭嗣同，虽然还没有机会与康有为会面，然而他的思想却与康有为等人的思想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在艰难的探索中，谭嗣同形成了自己改造中国的思想体系，找出了一条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针对朝廷内外死抱“祖宗之法不能变”的顽固势力对维新事业的扼杀，谭嗣同在致朋友的一封信中明确地指出：“当今清政府所实行的不但不是儒家学说所倡导的治国之策，而实际上是暴虐的秦朝所实行，并导致中国两千多年社会动荡不安、黑暗腐朽统治的制度和法律法令。实行这样的制度和法律法令还不如没有制度和法律法令，尚且如此还说这样的制度和法律法令不应该变吗？即使是在今天全部地采用周公所制订的尽善尽美的制度和法律法令，也不会有什么实效，因为时势已经不同了。”“在今天，借鉴外国的制度和法律法令，而弥补中国所无，这是中国挽救民族危亡的必由之路，是大势所趋。”他批评一些官僚只从外国引进机器技术不过是拣了芝麻而丢了西瓜，而学习西方的根本则是学习他们卓有成效的制度和法律法令。接着，他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案：改变官吏和民众的衣冠式样，迁都中原，皇帝除旧布新、开辟新的局面，改革水路粮运，开发水利，废除科举制度。创办各类学校，兴办铁路、矿业，改用钞票等。为了使改革方案得到顺利实施，他提出了保障改革成功的4项措施：筹集变法经费，创造变法的条件，树立变法的权威，招揽变法人才。谭嗣同变法思想的核心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为模式，改造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步思想不仅揭示了时代发展的方向，预示着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将面临着前所未有危机，而且标志着谭嗣同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奋斗历程。

二、振兴工商业

1896年春，谭嗣同随父亲北上到达北京。为了考察天津工业设施的发展状况，探索发展湖南工商业的有效途径，谭嗣同专程去天津参观那里的机器厂、轮船、船坞、铁路、火车、铁桥、电线等工业设施。在那里，他看到新引进的技术和设备，领略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对这些耳目一新的东西，他赞叹不绝，称赞这些设施规模宏大，至精至当。希望湖南以此为样板，发展湖南的工业。

然而，刚刚走出天津城，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情景映入谭嗣同的眼帘：由于去年水灾而陷入困境的灾民，自己搭席为屋，暂栖在河堤上。那些席棚只有一尺多高，长如身，看起来像个柜子。那些灾民面容憔悴，身体瘦弱，大约数千人。谭嗣同不忍心目睹这一惨景，怀着深深的悲哀，掩面而过。他想，这些难民已悲惨至极，然而又不知有多少难民不堪饥寒而死去。于是他发誓用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拯救同胞。

谭嗣同把振兴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当作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一个重要途径。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充足的资金用于赈灾扶贫，使灾民们得以糊口，恢复生产，进而不断铲除造成人民贫困的根源。然而，振兴工商业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中国人历经20多年，向西方学习，开办各种工厂，然而却困难重重，步履蹒跚，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对华侵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权益。在商品倾销的同时，进行资本输出。到这时，列强不仅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并逐步将侵略的魔爪伸向盐税、厘金（对生产运销过程中商品征收的捐税）和铁路建设。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使中国完全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痛感民族沦亡在即，而试图通过采取兴办实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方式，来挽救民族危机，抵制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势力的扩张。1895年到1898年间，国内新创建的商办厂矿有60多家，其中80%属于轻工业，总投资额为1240多万元。但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来自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挤和封建政府的压制，步履艰难，封建政府对民族工商业进行刁难、勒索，使民族工商业难于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在华企业竞争。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原料、廉价劳动力所开办的大型工厂，以其生产规模大，产量高，成本低的雄厚优势压倒了中国工业。在商品纳税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得到清政府的优待，而中国商品在流通过程中关卡重重，捐税繁多，这样就使得资金少、技术设备落后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在与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竞争中，受到排挤，而处于经常亏损乃至破产的境地。

谭嗣同看到帝国主义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中国民族工商业，十分忧虑。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鞭策着他提出救亡图存的方案：大力开采矿产，发展资本主义；用本国充足的经济力量来对抗列强的经济侵略势力，以使祖国真正富强。

去天津考察不久，谭嗣同的父亲为他捐官（用交纳捐款的办法取得官职），为候补知府，分司浙江。在临上任前，他拜访了光绪皇帝的教师翁同龢。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谭嗣同“通晓洋务”。6月底，谭嗣同到达南京任所。他到任后，目睹了官场的黑暗和官吏的贪婪。他特立独行（指有见识、

品行端正，不随波逐流），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谭嗣同虽身居南京，但振兴祖国工商业的抱负使他时刻关怀着湖南的兴衰，并与湖南的朋友频繁联系，商讨兴革大事。

刚刚就职的湖南巡抚（省级地方政府长官）陈宝箴，受到谭嗣同爱国思想的感染，接受谭嗣同实业救国的方案。于1895年11月，奏请清政府设立湖南矿务总局。不久，为了商谈创办矿业的具体办法，谭嗣同离开南京，赴湖南面见陈宝箴。恰巧这时欧阳中鹄也来到长沙，做陈宝箴的幕僚（官府中辅佐行政的人）。他对办矿有一定经验。谭嗣同万分喜悦，立即和他的老师进行商量。他们打算先从开采煤矿入手，运进机器，物色矿师，以期事半功倍。师生二人，情投意合，谈得十分热烈，一直到深夜，才把开矿事宜设计得滴水不漏，非常周祥。

湖南矿务局成立后，谭嗣同与欧阳中鹄、唐才常、刘淞芙等人共同筹建湘矿。与唐才常、刘善涵开始在浏阳东乡开采“安的摩尼”（即锑）矿石，矿石经过化验，证明是质量优良的稀有矿。于是唐才常筹划在浏阳西乡跃龙市创办煤井。谭嗣同并为已于1896年由官办改为商办的汉冶萍公司采办炼焦用煤，等等。

湖南矿务总局先后开采了煤、铜、锡、锑、璜等矿。把企业分为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三种形式经营。官办、官商合办的企业，由总局派员主持；官督商办企业，由商人自己管理，但总局要按章抽税，会同地方官“维护”地方局面。在三种企业中，官办、官商合办的企业，因官员徇私舞弊，经营不善，收效不大。而改为商办以后，如益阳板溪锑矿，获得了较多的利润。因此，不少人要求由商人独立创办企业。对此，谭嗣同坚决支持。他多次请求陈宝箴，允许商人招股开矿，设厂生产，并准其专利若干年。在谭嗣同的呼吁下，以往开办的一部分官督商办矿业企业改为商办。同时，私人创办的工矿企业也陆续出现，并获得明显的发展。士绅梁肇荣等创办了湖南水利公司，获得专利10年。湘潭人张本奎等创设化学制造公司，制造樟脑，被允许在湖南境内专利15年。此外，张祖国等创办的和丰火柴公司，黄自元等创办的宝善成公司，也曾得到湖南当局的鼓励。

自长沙至湖北蒲圻、咸宁、江夏等县站，设置了有线电报。在交通和运输方面，谭嗣同筹划了湘粤铁路、内河轮船公司的兴建。当时，宝善成公司创办电灯，先在衙署内试照后，打算扩大到全城。但有些人窃窃私议，怀疑电灯有损人的健康，况且电线交错，难免招致火神之灾。为此，谭嗣同写了一篇《论电灯之益》的文章，根据他所理解的自然知识，加上推测，说明电灯的益处，消除人们不必要的疑虑。

谭嗣同积极参与了在湖南兴办资本主义工矿企业的活动。在此期间，他深刻体验了在内部资金缺乏和外来势力排挤的情况下经营企业的艰难。

当时湖南矿务总局决定对商股进行控制，如接收唐才常、刘善涵和谭嗣同等筹划开办的“安的摩尼”矿，改为“官办”。谭嗣同对于这种排斥民族资本的行径非常不满。指出：这样一来，企业的权与利都被当局所占有，不但民不准过问，即使是一切有益的公事也都不能分享其利，这是“最不善的办法”。改为官办的“安的摩尼”矿，由于当局“负责人压抑商股而专横跋扈，同时又巧立名目，敲榨勒索以饱私囊”，而惨淡经营。这些使谭嗣同深切感受到“上权太重，民权尽失”，感受到封建专制政府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压榨与摧残。

在与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人物的交往中，他更深入地了解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产生了强烈的愿望：新兴的资产阶级必须摆脱封建势力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桎梏，争取得到政治上的解放，并分享一部分政权，然后才可能冲破封建经济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干扰，而使资本主义获得顺利的发展。所以他一方面希望封建地主投资于新式企业，并设立学校，讲求科学技术，培养专门人才，以便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工业和农业纳入机器生产的道路；另一方面希望统治者改变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借鉴西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经验，允许“官民”自由地兴办工矿企业，不但“予以自主之权”，不加“禁阻”，而且“鼓舞其气”。减轻捐税，如果厘金暂时不能废除，也应“以学会及商会中人办理厘金之事”，使资产阶级拥有参与理财的权利，从而杜绝征收厘金的种种弊端，然后逐渐代以印花税，这样才能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才有可能与列强并驾齐驱。为此，就必须实行政治上的变革。

三、推行湖南新政

湖南是变法维新运动中最有成效的一个省。而在其中扮演推动和领导角色的人物，应当首推谭嗣同。

1897年10月，谭嗣同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从南京回到湖南。与湖南学政江标、按察使（主管地方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的官员）黄遵宪以及熊希龄、皮锡瑞、唐才常等人，一同开始了推行湖南新政的工作。

倡导、兴办学会是湖南新政中一项重要内容。追溯中国历史，中国古代并没有学会这种事物，学会的产生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觉醒的标志，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组织成立的。维新人士认为，近代中国屡屡被列强打败，是因为全国4亿人形同散沙，大家没有为民族和国家利益奋争的凝聚力。因此，要使中国摆脱危亡，就必须“合群”（结成团体，协同一心，共纾国难），养成公德。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借助学会，开发民智，培养民德。

1895年，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强学会（由拥护光绪皇帝的官员文廷式出面组织，会长由户部郎中陈炽担任），这是维新派成立最早的具有政治团体性质的组织。强学会以挽救时局为宗旨，每10天集会一次，大讲“中国自强之学”和挽救民族危亡的道理。强学会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教师翁同龢的支持，曾一度吸引了许多官员和士大夫。会员数千人。强学会成为传播变法思想、积蓄维新力量的阵地。然而在1896年初，北京强学会遭到朝廷封禁。谭嗣同听到强学会被清政府封禁的消息后，极为愤慨。原本并未参加强学会的谭嗣同，偏偏在强学会被封禁之后，立即在汉口着手建立湖南强学分会。经过多方努力，强学分会虽然没有建成，但却表现了谭嗣同与封建势力勇敢抗争的精神。

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帝国主义日益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康有为在上海闻讯后，急速赴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指出：瓜分大祸，迫在眉睫，必须当机立断，迅速维新变法，否则“皇上与大臣想在都城做一个平民百姓都做不成了”。光绪皇帝读后深为感动，表示不甘做亡国之君，随即准备亲自召见康有为。恭亲王奕訢和一些守旧大臣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为借口，从中阻拦。光绪帝改令康有为上递条陈（向上级陈述意见的文件）。

这时，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思保湖南之独立”，使“南支那”可以不亡，因而筹议组织南学会。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南学会于1898年2月成立。组织南学会，本是想从湖南一省做起，逐步把南方各省仁人志士联合起来，共同探讨爱国之理，寻找救亡之法。南学会在长沙设立总会，由陈宝箴选派本省10位士绅担任总会长，再由这10人联络会友。会友分三类，一是议事会友，由南学会创办人谭嗣同、唐才常充任，职责是议定会中事务章程；二是讲论会友，定期讲学，随时答问，公推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地理；三是通讯会友，承担回复咨询的工作。南学会规定每周开一次大会，或公议地方的事情，或由谭嗣同等人发表演讲。听众十分踊跃，每次都有近千人参加。

谭嗣同演说时，常常挥动有力的手臂，气势激昂，他的观点明晰，语言犀利，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在南学会。谭嗣同发表的第一次演讲题目是《中国情形危急》。他沉痛分析了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而面临着的被瓜分的

危险。在《论今日西学皆中国古学派所有》的演讲中，他热情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进代论和天赋人权论的思想，猛烈抨击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谭嗣同对着千百位听众大声说：“君主是什么？他应是老百姓推举出来为天下人办事的人。在君与民的关系中，民为本，君为末，先有民，后有君。如果君主骄奢淫欲，不能替天下人办事，人民就有权废掉他。实行变法就是要废除君主专制，还政于民，这才是救国的根本之道。谭嗣同在演讲《论全体学》（即生理学）时，他形象生动地说：“大自然造就出像精巧机器一样的人体，就是要让人们顶天立地，干出一番事业。大家想想，这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为给人当奴仆、做牛马的。我们现在不振作起来，离给别人当奴仆、做牛马的日子不远了。”听着这些闻所未闻、又着实说到人们心坎里的话，台下屡屡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

谭嗣同希望通过南学会来团结维新人士，开导风气，并不只是着眼于湖南，而是以湖南为基础，将变法成果扩及全国，力图掀起全国性的变法维新运动。同时，谭嗣同还寄希望南学会在一定程度上担当起“议院”的作用。他认为，要图谋改革，实施新政，关键在于平权：“即官不可居民之上而独尊，民不可受制于官而尽失其主人之权”。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使南学会有议政之权，谭嗣同指出：“西方国家对于议事和办事机构的区别是最严格的。议院是议论政事的机关，官府是行政机关，这种制度表明，议政和行政各不相侵，也没有偏重，议政和行政体现大公无私，公开地互相牵制。这种统治办法是最善而又没有弊端的。”正是出于这种思想，谭嗣同希望把南学会办成全湖南省的总学会。府厅州县设立分学会，分学会受成于总学会。如果官府要兴办什么事业，应首先与学会商议，学会议定后，官府才可以实行。如果意见不一致，则要遵从学会内多数人的意见。如果百姓想兴办什么事业，首先要将议案呈送给南学会的分学会，分学会转呈给总学会，总学会同意后，所提议案就可以实行了。一定要使大吏不敢肆意骄横，小吏不敢欺压百姓，如果照此行事，便能够达到兴利除弊的目的。谭嗣同以南学会为活动中心，团结了一部分迫切地要求革新的维新人士，并得到陈宝箴的支持，他对湖南的兴革事宜多资策划，从而促使湖南的维新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

在南学会的影响下，湖南各府州县纷纷组织学会，最著名的是浏阳群萌学会、郴州舆算学会、常德明达学会、衡州任学会。这些学会团结有志之士，研习算学、物理、化学、地理、经史大义、掌故，培养改造社会的人才，对于削弱陈腐守旧的顽固势力，传播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南学会积极参与推行新政，倡导设立课吏堂，以培训新式官吏。开办课吏堂是使那些不懂得世界发展形势，不懂得近代知识的守旧官僚进修学习。陈宝箴对此深表赞同，并责成黄遵宪总理其事。课吏堂的课程，分为学校、农工、工程、法律、警务、外交六类。官吏所进修的课程，都是湖南新政的重要内容。

在南学会的倡导下，湖南仿照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形式，设立了一个由官绅合办的维持市区秩序的机构——保卫局。谭嗣同建议保卫局，不仅要能够抵御帝国主义的蹂躏和屠杀，而且要附属设立迁善所，拘留有流氓、拐骗、盗窃等行为的人，强制他们劳动、学习技艺，使他们在被释放以后，能够弃恶从善，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不仅如此，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在积极创办学会以外，还致力于移风易俗

的工作，使得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方面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把戒除妇女缠足作为社会风俗变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广为宣传，认真组织。1896年广东顺德县倡立“戒缠足会”。随后，梁启超也在《时务报》上发表《戒缠足会叙》，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痛斥歧视损害妇女的封建陋习。1897年，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等在上海发起“试办不缠足会”。1898年春，维新派人士荟集湖南，由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唐才常、徐仁铸、熊希龄等16人为董事，在长沙发起“湖南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的女子。在总会之外，有些县还成立了分会，参加和捐助者十分踊跃。不缠足会搞得有声有色。

与此同时，谭嗣同、熊希龄在长沙成立了延年会。它是一个树立新风、反对旧习、破除恶俗，讲求效率的群众团体。它的《章程》规定，会员要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每天都要做体操，不搞无谓的社交应酬，婚丧嫁娶要从简办理，反对起居无节、酒食征逐等等。实际上是提倡文明、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反对愚昧、腐朽的生活方式。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考试制度，是封建政府遴（lín）选官员的主要途径。时至近代，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地指出，这一制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谭嗣同认为，变通科举是“育才之本”，提出自1896年起，各种考试都应兼考一门西学。不能晓西学的人，虽然八股文做得极好，也不予录取。要变法，就应当以教育为急务。但是，中国的教育制度落后于西方，自明朝以来，采用的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报考人员不能发表个人见解。考生答卷行文格式严格规定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文体死板，内容空洞，千篇一律。这种禁锢人们思想的科举制度，使知识分子将少壮心力都用于死记硬背八股文，虚耗精神。这种制度对治国兴邦、挽救民族危亡毫无用处。八股取士导致人们对科学测算一无所知。为培养国家有用的人才，必须废除这种陈腐的教育制度兴建学校。而教育贤才，又应当以学习算学、物理、化学为主。

1895年，谭嗣同与好友唐才常、刘善涵等商量，准备在浏阳设立算学馆。谭嗣同上书欧阳中鹄和湖南学政江标，请求将浏阳南台学院改为算学馆。谭嗣同又拟定了算学馆《开创章程》和《经常章程》，除规定时间学习算法外，其余时间温习儒家经典、历史，阅览外国史事、古今政事、中外交涉、算学、物理、化学、等书籍及各种报刊。谭嗣同的主张，得到他的教师欧阳中鹄及唐才常等人的支持，但是他们的行动却遭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那时，浏阳灾情严重，所以算学馆的兴建被迫搁浅。在这种情况下，谭嗣同邀集16人，组织了一个小型的算学学社，自己出资，购买书籍，聘请教师，开展活动。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1897年初建成了浏阳算学馆，迈出了举办新政的第一步。

时务学堂，是湖南新政中一个重要的成果，也是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基地。谭嗣同为了它的创立和发展，花费了很多的心血。1896年冬，湖南名士王先谦等人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倡议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次年春开始筹办工作。熊希龄被陈宝箴任命为提调（相当于校长），总理校务。学堂的经费，一部分来自当地士绅的捐助，一部分由陈宝箴拟于矿务余利及其它款项下逐年酌量提拨专款。经过多方努力，两江总督（地方最高长官，辖江苏、

安徽和江西省)刘坤一也允诺从湘岸盐务中每年拨款 7000 金,作为时务学堂的补充经费。然而有人从中作祟,只划拨 5000 金。为此,谭嗣同立即致函在籍侍郎(中央政府六部的长官)龙湛霖的儿子龙琰(bá)瑞,恳请龙侍郎向刘坤一疏通,争取按原议拨款。8 月,熊希龄完成招生工作,在黄遵先的建议下,熊希龄等人决定聘请上海《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和英文翻译李维格,分别担任时务学堂的中、西文总教习。9 至 10 月间,熊希龄连续致函《时务报》总理汪康年,商请梁启超、李维格二人赴湘工作,谓“时务学堂初立,一切读书章程、专候梁、李两总教习到湘中酌定”。熊希龄还担心汪康年不放心,所以致函在南京的谭嗣同做汪康年的工作。谭嗣同接信后,接连致函汪康年,催促他允许梁启超、李维格赴湘。

11 月,梁启超按时赴湘,同时还带来中文分教习叶觉迈和韩文举,充实了时务学堂的力量。在南京,谭嗣同还四处奔走,为时务学堂选购所需要的仪器,并运至长沙。时务学堂哪里有困难,他就挺身而出,多方奔走、筹划,那里的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了把时务学堂办成宣传维新变法、培养变法人才的阵地,谭嗣同曾夜访唐才常,特请唐才常去时务学堂任中文教习,助梁启超一臂之力,从而加强时务学堂维新派的力量。在此期间,谭嗣同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时务学堂的工作中,他的举动深为大家所敬重,熊希龄曾建议陈宝箴委派谭嗣同担任时务学堂总理。

谭嗣同经常与梁启超、唐才常共同研究时务学堂的工作,并给予他们大力支持。在课堂上,梁启超通过给学生讲授康有为的孔子改制、公羊三世等学说,来阐发变法维新、民主政治和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思想。时务学堂鼓励学生阅读介绍西方社会及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书籍。学生稍有进步思想,即在学生的札记上予以鼓励。谭嗣同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抨击君主专制制度,主张限制君权的内容和揭露清朝建立初年清军南下,在扬州大肆屠杀十天的暴行的《扬州十日记》,用活字印刷,加上按语,暗地散发给学生和其他要求进步的青年阅读,向他们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和反清的思想。

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以学堂为阵地,讲授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维新变法理论,倡导民权学说,使不少以前深受封建思想桎梏的学生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思想大为解放。后来,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成为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的骨干,有的参加了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讲稿,被列为《中西学门径书》,由 1897 年 4 月江标、唐才常等人创办的《湘学报》连续刊登,促进了变法思想更广泛地传播。接替江标为学政,并担任《湘学报》督办的徐仁铸还在《輶(yù)轩今语》的跋语中加以赞扬。《湘学报》与时务学堂互相配合,使长沙以外的湖南知识分子,都能够了解湖南实行新政的情况。

在时务学堂的影响下,湖南的一些开明士绅请求更改书院章程,岳州府士绅郭鹏、方付鸾等请求岳阳书院设置经学、史学、时务、地理、数学、诗歌散文六门课程。宝庆府武冈州拟将鳌山、观澜、峡江三书院的课程一律改为实学。时务学堂的设立对湖南学风影响巨大。谭嗣同在湖南推行新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创办《湘报》(日刊)。《湘报》由谭嗣同、唐才常创办于 1898 年 3 月 7 日,在长沙出版,每天 1 张。唐才常、熊希龄主编。主要内容有社论、奏疏、圣旨、本省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新闻等。在此之前,湖南曾刊行《湘学报》旬刊,曾不遗余力地鼓吹维新变法。但是,谭嗣同考

虑到，列强纷纷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因而要使民众更快地知晓国内外的局势，知晓中国所处的困境；而且新闻的时效性很强，今天是新闻，到明天已不能算新，何况 10 日呢？因此，要体现“每天都有新的内容和思想的追求”“并将这种风气传播到其他省”的精神，所以重新创立《湘学》日刊。

《湘报》是维新派宣传新思想和变法主张的喉舌，它所发表的论说文章一针见血，不仅有很强的感染力，令人精神振奋，同时具有深刻的说理性，让人从中受到民主思想的熏陶。《湘报》曾发表易(上:目;下:科)的文章《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文章主张“西法与中法相参”、“民权与君权两重”、“听民兴利除害”。这一天的报纸刚问世，便不断遭到顽固派的责难。陈宝箴也不得不因此而小心翼翼地责令报社不要再发表类似这篇“过于偏激、惊世骇俗”的文章。张之洞也为此痛斥这篇文章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严令报社痛改前非。谭嗣同先后在《湘报》上发表 20 多篇文章犀利的宣传维新变法的文章。此后在《湘报》上便很少见到谭嗣同的文章，这无疑说明张之洞对谭嗣同等人宣传维新的思想的压制，而谭嗣同等人那一篇篇像投枪一样的文章也的确使旧封建的顽固势力胆战心惊。《湘报》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学说，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介绍，对维新变法思想的鼓吹和宣传，对湖南以及各地维新运动的支持和介绍，推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增强了人们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自觉性。

维新运动的高涨，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极大恐惧和仇恨。他们攻击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是“名教（封建正名定分礼教）罪人”、“士林败类”。指责维新变法思想是“异端邪说”叫嚣“天下的祸患，不是外国列强，而是奸党（指维新派）。”他们要求清政府严惩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清除维新派。这种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在湖南表现得尤为尖锐。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纠集一批顽固守旧士绅，向陈宝箴递交《湘绅公呈》，攻击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使时务学堂的学生“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咒骂南学会倡导一切平等是“禽兽之行”，“树立无君无父的乱党”，指责民权学说是“背叛孔子的学说，毁灭败坏贵贱尊卑的伦理道德的常规”。并要挟陈宝箴整顿时务学堂，解除维新派教习。他们著书撰文，攻击自由、平等、民权学说是大逆不道。逼走南学会主讲人之一皮锡瑞，并给南学会邵阳分会负责人樊锥加上“率先倡导邪说，背叛孔子学说，败灭论常，惑世诬民”的罪名，将其驱逐出湖南。

当时，面对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对湖南维新事业的恶意的攻击诬蔑和阴谋破坏，维新派没有被吓倒，仍然一如既往地从事维新活动。湖南的顽固派看威胁诬蔑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王先谦等人便气急败坏地唆使在京的湖南人一齐上书朝廷，弹劾（t2nh6）陈宝箴等人。这些奏章恰巧被赞成维新的刑部官员杨深秀看到，他立即上书光绪皇帝，为陈宝箴等人鸣不平，赞誉湖南新政取得的成就，批驳那些顽固势力的诬蔑之词。光绪皇帝看到这些不同观点的奏折后，对湖南的新政事业大加鼓励，同时谴责顽固派的论调。

但是顽固派并未因此而停止对维新派的攻击和阻挠。他们在长沙城内外，贴满了匿名标语，对维新人士进行肆意攻击。他们纠集一些人哄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阴谋捣毁时务学堂。梁启超被迫出走，其他维新派人士也不得不离开长沙。在这严峻的形势下，谭嗣同感到：人在，维新事业就能延续下来；人走了，维新事业就半途而废，顽固势力便会乘机卷土而来。因此，他毫不犹豫地留在湖南，并且坚决地说：“平日各位互相劝勉的都是

‘杀身灭族’四个字，在这关键时刻怎么能刚遇到一点点灾祸就改变维新变法改造中国的初衷呢？……今天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中国才有复兴的希望……现在只是看谁勇猛了。”

四、冲破封建罗网

1897年，谭嗣同完成了《仁学》一书的撰写工作，全书5万多字。《仁学》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的纲常名教，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及反清思想为核心，全面地展示谭嗣同关于哲学、社会政治、民主及反清思想等方面的思想。

谭嗣同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和民主、自由、平等光辉的思想，是19世纪末特殊的时代和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所造就的。19世纪末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然科学和社会及政治学说纷纷传到中国。谭嗣同从少年起开始接触译自外国的图书和实物，对这些全新的知识，他表现出如饥似渴的追求精神。早年，他的教师欧阳中鹄，除了传统文化知识非常渊博之外，还对西方的自然科学有着广泛的兴趣，尤其是在算学方面有较深的研究。

在这样一位学贯古今博通中外老师的熏陶和影响下，谭嗣同四处游历，每到一个地方，他总要探访这个地方特有的先进仪器和设施。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他曾向他老师汇报北游途中会见傅兰雅，在那里看到古生物的化石、计算器、爱克司机。这些使谭嗣同逐渐形成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基本认识，使他开始深入地思考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同时，西方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也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见识。由此，他感到中国落后于列强的重要原因是科学不兴，民智未开。所以在朋友的协助下，他创立金陵测量会，后来又在湖南捐资兴建浏阳算学馆，研究科学理论，普及科学知识，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头脑自然会对人们考察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近代报刊杂志为谭嗣同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中法战后，列强不断加紧了侵略和瓜分中国的步伐。谭嗣同在创深痛巨的民族危机刺激下，开始揭开中国与列强在社会政治制度上歧异的奥秘。他羡慕德国和日本，认为俾士麦和伊藤博文是两位厉行改革的杰出人物，他们的工作使得原本孱(ch2n)弱的德国和日本一跃步入世界新兴强国的行列。他批评那些以为“船坚炮利”是国家强盛唯一原因的观点，是“不得要领”。在考察日本和德国的历史之后，他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于是否建立了一个先进的政治制度。因而，他相信，“果真能变革一切弊法，不出十年，中国一定能够自立”。

谭嗣同从师欧阳中鹄期间，他刻苦读书，那些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滋润了他的心田。墨子思想中平等兼爱，黄宗羲讲求实学、批判封建制度，魏源倡导“经世致用”，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传播的民主政治的制度和思想都对谭嗣同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谭嗣同的生活经历也是造就他产生进步思想的重要因素。从幼年起，谭嗣同就饱尝了社会和人生的辛酸。虽然他生长在官宦之家，但是却没有享受到更多的母爱；父亲受制于庶母，对他又十分严厉无情。待他年长时回忆起童年时代，仍愤愤不平：“我从小到大，一直遭受封建纲常名教的折磨，在苦难中挣扎，大概不是活着的人所能忍受，濒临死亡的边缘已有多次了。”正是这种特殊的生活感受，他没有在封建的论理道德面前屈服而轻生，相反，他感悟到人生命的价值是为了他人，为了社会，为了整个民族的命运。因此，他的思想挣脱了封建专制皇权至高无上的禁锢，而畅言无忌；他的行动摒弃了个人的名利、地位、富贵、荣辱，而为了维新变法赴汤蹈火。尤其是 30

岁前后，游历大山名川，结交变法同志，体尝百姓痛苦，更坚定了谭嗣同改革君主专制制度，使中国走向富强的决心。

由于社会、历史和个人的经历的作用，谭嗣同养成了一种特殊的性格，产生了独到的思想。在《仁学》一书中，主要表现在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和反清的思想。

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体现了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在回答世界的本原是什么时，尽管有不同的回答，但大多数人都未能摆脱唯心主义的羁（jǐ）绊，认为世界是由精神属性的东西构成的。谭嗣同根据自己对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了解，提出“以太”是世界本原的学说。

远在数千年以前的古希腊，华达哥拉斯派提出了“以太”这一概念。19世纪中叶，英国物理学家马克斯威尔创立电磁理论时，曾假定“以太”是一种传导电、光、热、磁的媒质，并用以说明物质的相互关系与物质运动的连续性。不久，严复和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把“以太”概念传到中国。谭嗣同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找出“仁”这个伦理学范畴，加以改造，拿来与“以太”相配合，以自然规律来解释客观世界的复杂现象。认为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关联、变化、结合与依存，都是“以太”的作用，并且把“以太”这种沟通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作用称作“仁”，而“仁为天地万物的本源”，所以把这种学问叫作“仁学”。

谭嗣同力图说明“以太”是不生不灭的，永存的，这种不生不灭的存在是不受任何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所主宰。而是随着“以太”不间断地运动和转换而处于日新的状态中，“以太”遵循一定的规律运动，整个宇宙也就以此方式永恒地存在下去。

谭嗣同对“以太”的研究是建立在他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了解基础上进行的。虽然，他对光热电磁的知识十分贫乏，还没有借助科学器仪的实验进行研究，但是却为他在社会政治方面提出冲击封建网罗提供了哲学基础。

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是紧密联系的。他提出了一个达到理想社会的途径：“仁——通——平等”，他认为可以用这一命题来考察和衡量一切的社会问题。通，就是去掉界限，仁的第一个根本要求就铲除君臣、父子、夫妇、男女、长幼……等的界限，使他们均处于平等的地位、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等以维护封建专制君权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的重压之下，封建帝王正是凭借这禁锢人们思想，束缚人们行为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使人们俯首贴耳地接受统治，维系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为了建立理想的社会，谭嗣同放达地发出冲破封建网罗的呐喊。

在维新变法期间，谭嗣同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不仅其深刻性和彻底性远远地超过中国历代和同时代的思想家，而且这一批判所具有的理论性、系统性和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无畏的精神达到了那一时代的最高水平。在谭嗣同的胸中，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封建意识形态的痛恨，交织在一起，像积压在火山之下的岩浆，奔腾而泻：“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求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然真能冲决，亦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故冲决网罗者，即是未尝冲决网罗。”在这里，封建的君主制度、奴役人的伦理道德、繁琐无用的考证写作诗文、包括佛教的各种宗教都被谭嗣

同认作是禁锢、折磨人的罗网。因为民“取代”“忠君”，把国家与国民结合起来，是谭嗣同思想的精华所在。

谭嗣同主张建立平等的父子、夫妻关系。他从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思想出发，提出男女选择爱人，都要遵循两厢情愿的原则，而不得男方强加于女方。

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中，谭嗣同认为只有朋友之间的关系是最完美的，这种关系体现出“平等、自由、尊重主权”的精神。要破除“三纲”之害，首在铲除君臣关系。谭嗣同注意到君臣关系是“三纲”中的核心，实现了君臣关系的平等，铲除了封建专制制度，改变其他父子、夫妻的关系才有了保障。

谭嗣同对“三纲”的批判，标志着资产阶级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清算已经步入理论和系统的水平。就此而言，他的思想远远地走在康有为等人的前边。

谭嗣同对历代统治者以及清政府所实行的专制统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表现出民主革命的色彩。

谭嗣同首先从论理上说明了古来并无君臣，而后才有，君臣本来是平等的，君权并非是上帝授与的，借以从根本上摧毁“君权神授”、神圣不可侵犯的立论基础。他指出：“起初，人类社会没有君臣之别，大家都无法治理公共的事情，因此大家推举一人做君。因为是大家推举的君，所以大家也一定可以废掉他。君，是为全体人民办事的人，而不是竭尽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供他骄奢淫逸的。”他指责秦始皇为了维护万世一姓的统治，发明了一切残酷暴虐人民的办法。而后世帝王竭力效法，并倡导忠君思想，为君而死。但是，“人民只有为国事而死，而决没有为君而死的道理。”因此，古代所说的“忠”是多么的愚昧呀！“忠”，即诚实的意思，怎么能只要求臣向君尽忠，而君却可以任意奴辱臣民呢？而且，历代帝王都把忠君与爱国联在一起，口口声声说“报国”，实际上民是国家的根本，报国应是为民，离开为民而谈忠，那是本末颠倒，荒谬至极。应变“忠君报国”为“为民报国”。

谭嗣同尖锐地指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是“秦始皇暴政”横行的历史；两千年来的帝王，都是“独夫民贼”。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而人民的权力全部丧失，这是中国长期以来衰弱的根本原因。因而造成中国没有平等，没有公理，各级官吏奴役百姓残忍至极。他指出，“国家的权力本来不是一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所能承担的，以区区一人，而担当亿万人的权力，就像是一人而到亿万人家，代人谋划生产生活。这种情况就如同让小孩替有功夫的匠人砍木料，让侏儒像乌获（战国时的大力士）一样举起万钧之物。要是这样，这一人怎么能不断指而绝腓（b@n，膝盖骨）呢？”因此，他主张铲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政治。

谭嗣同不仅抨击历代的专制统治，而且还把抨击的矛头对准当时的清王朝。首先，他揭露了清初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暴行，指出那些屠杀掳掠与历史上的隋炀帝等人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他还倡导人民学习历史上的农民领袖，揭竿而起，推翻腐败统治：“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过去杀死君主是天大的罪过，今天，“贪暴的君主，人人都可起来除掉他，这一举动本来就无所谓叛逆。而叛逆的罪名是君主为恫吓天下人民而设立的。”

虽然谭嗣同的《仁学》是在他壮烈牺牲后才得以发表，但他在写作中曾请朋友阅览，他的思想和精神早已为人们传颂。

五、推动变法

为了变法的成功，谭嗣同已经随时做好了赴汤蹈火流血牺牲的准备。当时，谭嗣同等维新派在湖南推行的变法工作，遭到破坏，几乎全部停顿。面对朝野内外强大的顽固势力对维新事业的阻挠和扼杀，谭嗣同感受到在中国实行变法的艰巨性和必要性，因而在进行和平改革遇到破坏时，他又开始寻求用武装斗争的手段改造中国的途径。

哥老会是清朝具有反清性质的秘密团体，成员来自手工业工人、破产农民、退伍军人和游民，他们的首领称“袍哥”。据记载，湖南是哥老会组织的重点活动地区，约有12万会员，他们崇尚刚正侠义，经常袭击劫夺豪强及贪官污吏的不义之财，而相约不侵扰平民。哥老会组织的特点及其反清宗旨，使谭嗣同为之向往。因此，谭嗣同与唐才常决定按照毕永年提供的线索，联络大江南北的哥老会与散兵游勇，在其内部设立自立会，作为哥老会的领导核心，准备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使这支反清力量发挥作用。并准备在京结纳有志之士，作为接应。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此后，侍读学士（翰林院中讲论经史以备咨询的官员）徐致靖于6月13日上奏折向光绪皇帝推荐谭嗣同与康有为、张元济等。认为谭嗣同具有超绝的天才和无可比拟的学识，忠心爱国，勇于担当重大的事情，不躲避艰难，不畏惧别人的攻击和怀疑，在朝廷中可以任命为参谋之官，在地方可以为皇上冲锋陷阵制敌取胜。如果谭嗣同等被皇上重用，以备皇上咨询参与新政或在学堂工作，使他们任教，或开办译书局，让他们从事翻译工作，一定能做得恰如其分，轻而易举，很快地显见出实效来。奏折当天上奏。光绪皇帝当天就有上谕令“送部引见”。

谭嗣同接到上谕后，感到光绪皇帝决意变法维新，中国的改革有了希望，国事大有可为，自己的理想就要付诸实现了。他兴奋得彻夜未眠。但这时的谭嗣同头脑是十分清醒的，他知道光绪皇帝宣布变法，只是表明变法的开始，今后的道路会更艰难，将面临更大的阻力和考验。离行前，他再三嘱咐妻子李闰，要“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在给时务学堂学生的留言中，他引用佛经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意，写下了“我不病，谁当病者”的话，从而表明谭嗣同时刻准备为变法献身的勇敢精神。

在湖南新政蓬勃发展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鼓吹变法维新思想，阐发改革主张，劝说光绪皇帝赞同变法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在1896年至1897年初，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知识分子为了“去塞求通”，有助于发现和铲除社会弊端，创办了一系列报刊，这些报刊成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和主张，批判并回击封建顽固派的阵地。比较著名的有徐勤等主编的上海强学会机关报《强学报》（上海），梁启超任主笔、汪康年任总经理的《时务报》（上海），章太炎任撰述的《经世报》（杭州），章太炎主笔的《译书公会报》（上海），夏曾佑创办的《国闻报》（天津）。这些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问世，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

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重要文章在《时务报》陆续发表，深刻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猛烈抨击顽固势力的因循守旧，明确提出中国要变法图强，必须学习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系统阐述了变法维新理论，着重强调了变法的必要性。

《时务报》很受知识界的欢迎，数月间销行万余份，成为维新派的主要喉舌。《国闻报》陆续发表了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进化论），其目的在于说明中国如能顺应“进化”的规律，进行变法，那么就会由弱变强，否则将会沦于亡国灭种而被淘汰。号召人们“自强保种”，救亡图存。这在当时的思想界，确实象一阵惊雷，震动了全国。许多人纷纷以进化论为武器，要求改弦更张，寻找新的出路。

与报刊相呼应的是谭嗣同主持的南学会、时务学堂等全国各地的学会、学堂。在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出现的学会和报刊，不但打破了清朝统治者对结社的禁令，在城市知识分子和士绅中初步形成建立民主性团体的风气，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传播了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和自然科学的新知识，培植了平等、自由的思想，从而为变法维新运动扩大了社会基础。维新派自己创办的学会和报刊，联系了一批具有民主意识和变革志向的知识分子，这是中国国内最早形成的一支自觉的民主力量。在这支力量的带动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已经形成，封建的传统思想和顽固守旧的社会风气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呈递了《应诏统筹全局折》（上光绪皇帝第六书），请求光绪皇帝正式确定维新变法政策，选拔人才，改革中央政权机构。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再次申述变法的重要性，批驳顽固派对变法维新的种种责难。他说，世界各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中国要想救亡图存，必须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全面变法。当务之急是采取三项措施：如召集群臣，诏定国是；设上书所，广招贤才；开制度局（具有立法职能的新政领导机构），重定章程等。康有为建议光绪皇帝仿效日本的经验，设立法律、度克（掌管财政）、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12局，推动中央变法，实施新政。光绪皇帝对这个奏折非常满意，把这个奏折放在御案上，每天都要浏览，对于世界各国胜败兴衰的原因更加明了。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的志向更加坚定。

康有为除给光绪皇帝上书外，又于4月在北京发起组织以救亡图存为号召的保国会。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各省、府、县设立分会。在保国会的影响下，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相继成立。保国会的出现，为后来的百日维新作了直接准备。

自1895年公车上书以来，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维新派的力量不断壮大。北京、上海、湖南、天津以及广东等地的维新运动普遍高涨，维新派已创办了3000多所学会、学堂、报馆、书局，从而为百日维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到1898年春夏之交，变法与反变法，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帝党与后党之争日趋激烈。处于无权地位的光绪皇帝，不愿做亡国之君，颇想有所作为。

光绪皇帝，即爱新觉罗·载湉，是道光皇帝的孙子，同治皇帝的从弟。同治皇帝早夭无子，慈禧太后为了继续垂帘听政，于1874年择立年仅4岁的载湉入继大统，是为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在位期间，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在皇帝和慈禧太后周围逐渐形成两股势力，产生了帝党和后党的权力之争。

1889年，19岁的光绪皇帝举行“大婚典礼”，按照清代制度，此后皇帝

应该“亲政”，慈禧太后不得不宣布“归政”，退居颐和园，但要政还须请示她。她仍掌握着清政府的内外大权。光绪皇帝经历了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和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感触很深。他在甲午战争时是主战的，本想藉对日战争的胜利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料中国遭到惨败，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战后财政非常困难，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淮军所剩无几。而人民的反抗，如西北的回民，四川余栋臣和山东、湘赣的会党（大刀会、哥老会）的武装暴动，给予清政府严重的威胁。加上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危机，都使光绪皇帝十分忧惧。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权，必须重练海军，重理财政，这就使他倾向于改革，通过改革从慈禧太后手中夺得实权，改变国家衰弱的局面。经过康有为等人多次上奏书催促，加上帝党官员与维新派的积极活动，光绪皇帝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实施变法。

谭嗣同接旨赴京，途经湖北时，突然生病，不能立即赴京。光绪皇帝电催“迅速来京，毋稍迟延”。于是，谭嗣同抱病动身，于8月21日到达北京，住进宣武门外的浏阳会馆。浏阳会馆与康有为住的南海会馆相隔不远，二人常常相互磋商、研究如何推进变法运动。

9月5日，谭嗣同觐见光绪皇帝，表达了自己的政见。光绪帝对他很欣赏。光绪皇帝在特许康有为专折奏事并任命他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后，于谭嗣同觐见的当天便下令破格授予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

第二天，光绪皇帝召见谭嗣同，皇帝表示，他早就要图谋富强，不愿别人骂他是“昏君”，“没有办法，太后不允许变法，又有满洲各大臣总是说要守祖宗之成法”，他“自己的确束手无策”。又叮嘱谭嗣同，凡“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他“必依从”。

谭嗣同等军机四卿的具体工作是阅览全国臣民的奏折、上书，并拟出处理办法，“凡事关新政者，每令拟旨，大军机不与闻”，谭嗣同等也不向他们通告。军机处是清政府的中枢决策机构，一切国家的重大决策，包括人事任免，都由该处官员参与制订和决定。谭嗣同等成了光绪皇帝推行新政的心腹参谋。

为了报答光绪皇帝的信赖，也为了实现自己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抱负，谭嗣同悉心尽力地工作。谭嗣同考虑到康有为提出的变法措施（包括替别人所写奏折中提出的）还必须补充更为切合现实的新内容，所以他在9月12日为光绪皇帝拟了一道值得注意的谕旨，谓“国家振兴百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较勤，故可补我未及。今士大夫昧于域外之视者，几若彼中全无条教，不知西国政治之学，千端万绪，主于为民开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乃能美人性质，延人寿命，凡生人应得之利益，务令其推行无遗。”指出目前所进行的各方面改革并不是“崇尚新奇”，而是为了使“赤子”得到“康乐和亲”。中国处于“各国环处，陵迫为忧的局面，不吸取西人的长处，便不能发展我们已有的长处”，而“不肖之官吏，与守旧之士大夫”却不明了这个道理，“相互鼓励谣言，使百姓疑惑而惊恐”，必须切实纠正，“以成新政，以强中国”。在这里，谭嗣同强调变法主要是“为民立政”（他所说的民，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必须认真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学说中汲取那些经济上和文比上能充分体现“民”的利益的东西，从而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侵袭，进而跻于富强国家之列。这表现了他比较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和爱国思想。

一次，光绪帝批下一个奏折，要谭嗣同逐条批驳。原来，这个奏折是顽固守旧分子、湖南举人曾廉写的。他罗织康有为、梁启超的罪名，要光绪皇帝杀康、梁以谢天下。光绪皇帝害怕这个奏折落入慈禧太后的手里，于是要谭嗣同起草一个文件，逐条批驳曾廉的诬陷。谭嗣同用了一个晚上，一气呵成，文末用挺拔刚隽的楷书，字字有声地写下自己的意见：“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如果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给我定罪。”为了保护变法运动的旗帜，谭嗣同完全置自己的安危于度外。

从6月到9月，康有为本人或代其他官员起草的变法奏折50多件，大部分被光绪皇帝采纳，并以上谕形式发布全国。

从6月11日到7月下旬，光绪皇帝颁布的新政主要是经济、军事、文教方面的改革。经济方面有：保护农工商业，成立农工商局，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发展铁路和采矿业；设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取消由国家供养的特权，等等。文化教育方面有：设立学校，创办京师大学堂，各地普遍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学科；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内容为中国史事、清朝政治），开设经济特科（内容包括内政、外交、理财、农桑等专门之学，被录取的从优分发有关部门工作）；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设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等等；军事方面有：裁减旧军，训练新式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力行保甲制度，等等。从7月下旬到9月下旬，新政由经济、文教、军事方面扩展到政治方面。主要改革有：提倡官民上书容言事，命各省保荐人才；改革旧机构，裁撤闲散重叠的机构；裁汰冗员，澄清吏治，等等。

新政的内容，虽然没有涉及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的设议院、开国会、宣宪法等政治主张，但是毕竟对旧制度进行了不少改革。变法诏书的颁布，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参预政权。因此，这次变法受到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地主的拥护，得到爱国知识分子的支持。在变法高潮时期，“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言变法”；一度出现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政治局面，引起了社会震动。光绪帝令各省总督巡抚将6月11日以来的新政招书印刷各州县，令教官详细讲解，并在督抚衙门悬挂，这显示了光绪帝除旧布新的决心。

变法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废除八股取士，使举国守旧迂谬之人，失其安身立命之业，自是日夜相聚，阴谋与新政为敌。撤并政府机构和裁汰冗员，将使大小官僚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令旗人自谋生计，更引起惯于寄生生活的八旗子弟及守旧势力的仇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封建顽固势力，从变法法令下达之日起，就极力进行阻挠和破坏。对光绪皇帝的一系列关于变法和新政的诏谕，除了手无实权的某些开明帝党官员表示支持，湖南巡抚陈宝箴能认真执行，湖北巡抚曾钰也比较热心之外，其他各省督抚则观望敷衍，甚至抵制。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对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声称“部文未到”，谭钟麟则置若罔闻。光绪皇帝虽然也谕令奖励陈宝箴，斥责刘坤一和谭钟麟，但新政在绝大多数省份仍然不能推行。因此，光绪皇帝关于变法的许多诏谕，大都成了一纸空文。而阴险狡诈的慈禧太后集团，从新政一开始，就加紧布置，准备反扑。

“明官国是”诏书颁布后4天，即6月15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绪皇帝在一天之内连发3道谕旨：第一道是下令免去光绪帝师傅翁同龢的军机大臣和

总理衙门大臣等职务，驱逐回籍。翁同龢本系支持变法的帝党首领，他的被革职，无疑是对光绪皇帝和变法运动的沉重打击。第二道谕旨规定，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官员，必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已经“归政”的慈禧太后，照例不再召见大臣。这一违反常规的举动无疑是要重新控制光绪皇帝，抓住朝廷用人权，阻塞光绪皇帝与破格重用维新派和支持变法的帝党官员的渠道。第三道谕旨是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又实授荣禄统帅北洋三军，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士诚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并加文渊阁大学士衔（军机大臣及内外名官之资望特重者，授大学士作为荣典）。于是荣身兼将相，权倾举朝。同时，慈禧太后又广布心腹，把北京城内外和颐和园的警卫权牢牢抓到自己手里。

面对慈禧太后的一连串打击，9月4日，光绪皇帝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ku0），侍郎堃岫（k&n xi*）、徐会沆、溥頫（t!ng）、曾广汉等六人全部革职。同时授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9月5日，光绪皇帝又破格任命谭嗣同等系机四卿，加紧推行新法。9月7日，把阻挠新政的李鸿章等人逐出总理衙门。

光绪帝的这些反击措施，更加激起了慈禧太后的恼恨，下决心扑灭新政，于是不断派人去天津与荣禄密谋策划。京津一带盛传10月间慈禧偕光绪皇帝去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废掉光绪。

9月14日，光绪皇帝决定开懋（m2o，勤勉）勤殿，计划任命李瑞藻（f5n）、徐致靖、康有为、杨深秀、康广仁、梁启超、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为顾问，咨询改革官制等方案。光绪帝为了避免慈禧太后和守旧大臣的指责，就让谭嗣同根据内监拿出的康熙、乾隆、咸丰三朝“圣训”，拟写“诏谕”，然后请命于慈禧太后。谭嗣同从这件事，看出了光绪皇帝确实无权，而受制于慈禧太后；同时想到天津阅兵的时间迫在眉睫，将要出现非常激烈的斗争，而维新派虽然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取得了草拟谕旨和阅览奏章的权力，但没有掌握军队权，也就无法来保障变法运动的推行和防御顽固派的迫害。

在这种情况下，谭嗣同考虑到如何利用光绪皇帝的关系结纳拥有重兵的将帅为援。究竟召哪一部分“外兵”最合适？谭嗣同和康有为研究后，认为曾加入强学会并握有7000人武装的袁世凯可为己用。于是派遣徐致靖的侄子徐仁录去天津小站探视袁世凯的虚实。见面时，袁假意恭维维新派。与此同时，谭嗣同密荐袁世凯有“将才”，要光绪帝“先发制人”，把顽固派所依靠的慈禧太后“监禁在颐和园，以期制止顽固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光绪帝看了谭嗣同的密折，立即采纳，招令袁世凯入京觐见。光绪皇帝于9月16日召见了袁世凯，夸奖他练兵有功，并提升他为侍郎，叫他专办练兵事务，以保新政。

9月中旬，政变风声四紧，光绪皇帝在惊惶失措之中，于14日黎明时召见杨锐，问他是否可想一良策，既可排除维新变法的阻力，除旧布新，使中国转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并泣涕商量保全之策。杨锐原是张之洞的门生，以新进官僚表示支持维新而得到光绪帝的信任。但此时他畏惧推辞，于是光绪帝写一道密诏，说自己“位且不保”，要杨锐和康有为、谭嗣同等商量，赶紧设法“相救”。杨锐接受密诏后，惊惶无策，数日隐匿不敢出门。

光绪帝召见袁世凯的当天，前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问安，了解到阴谋政变的危急情况，就于次日回宫后，写第二道密诏约林旭带出，要康有为迅速

出京，留着性命以便今后为他出力。之后，光绪帝又召见袁世凯，向袁世凯授意：回天津后，“即带兵入京师”，“以免意外之变”。

袁世凯本是李鸿章提拔的洋务派官僚，虽曾参加过康有为倡办的强学会，只是籍此沽名钓誉，根本没有一点要求变法的思想。此时他正心怀鬼胎，表面应付，而内心是不愿冒险地与掌握军政大权的后党为敌。所以他在光绪帝召见后，就谒见刚毅、王文韶、裕禄等属于后党的大臣，扬言自己无功受禄，一定力辞，籍以试探这些权贵的口气，并企图表白自己虽被光绪帝所提拔，但并没有丝毫与后党为敌的意思。

顽固派得知光绪帝召见并提拔袁世凯后，荣禄立刻密谋制造了英俄在海参崴开战的谣言，借机调动聂士诚的武毅军移驻天津陈家沟一带，守住北京至小站的过道，以防袁世凯的军队西行；又调动董福祥的甘军移驻北京南面的长辛店，准备对帝党和维新派进行镇压。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布置政变，已呈剑拔弩张之势，而光绪帝的第一次密诏，直到9月18日早晨，杨锐才交给林旭。林旭马上将两道密诏分别带给谭嗣同和康有为。康有为、谭嗣同看了光绪帝的密诏后，相对痛哭，束手无策，除拉拢袁世凯之外，又幻想取得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挽救败局。

英、日帝国主义为了和沙俄争夺在华霸权，曾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变法。维新派轻信了他们的诺言，称赞英、日帝国主义是“救人之国”，并奏请光绪皇帝联合英、日对抗顽固势力。英、日帝国主义也密切注视中国政局的发展。9月14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到北京。他原想博取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的信任，操纵中国政治，但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败局已定，便无意支持光绪皇帝的维新变法，只对光绪帝和维新派虚表“同情”。康有为等人也曾到外国驻华使馆要求支持，但毫无结果。

9月18日，谭嗣同急电唐才常：“速偕同志，来京相助”。晚上，谭嗣同独自一人急赴袁世凯在北京的住地法华寺。他不等通报即闯入袁宅，他开门见山地问袁世凯：“荣禄他们准备趁皇上到天津阅兵的机会，阴谋废掉皇上，你听说了吗？”袁世凯回答：“嗯，我听到一点传闻”。谭嗣同接着说：“现在皇上大难临头了，只有你一个人能够救他，你如果愿意救，就救他；不愿意救，就请你到颐和园慈禧太后那里去告密，杀了我，你就可以享荣华富贵了！”袁世凯看到谭嗣同声色俱厉，腰间隆起，好像携带着利刃，知道他不达目的，是不会轻易走的。便假惺惺地说：“你把我袁某当成什么人了？你我都是受过皇上特殊恩典的人，救护皇上，不但是你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有什么，你就尽管吩咐，我袁某一定万死不辞！”

听了袁世凯的话，谭嗣同以为袁世凯已被说动，连忙拿出光绪帝的密诏，激动地说：“你如果真心救皇上，就立刻回天津，杀死荣禄，然后率兵进京，一半兵力包围颐和园，一半兵力守皇宫保卫皇上。”并告诉袁世凯，他自己已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告湖南召集良将多人，很快就到，他将率领这支武装力量除掉慈禧太后这个老朽。

袁世凯听了这番话，左右推托，经谭嗣同再三催促后，袁世凯才表示：“如果皇上在阅兵时，迅速跑到我的大营里，传令杀奸贼，我袁某一定拼死去干”。谭嗣同说：“荣禄可不是等闲之辈，恐怕不那么好对付吧？”袁世凯拍着胸脯满口答应：“如果皇上在我军营里，只要命令我下手，那么杀一个荣禄就像杀一条狗那样容易！”。谭嗣同提醒道：“恐怕等不到10月，就会发生变乱，势甚迫急，必须早做准备。”

袁世凯借口事机紧迫，必须立即回天津部署。袁世凯骗走谭嗣同后，反复筹思，如痴如病。他感到光绪皇帝既没有实权，又没有军队；维新派也是空谈书生；慈禧太后掌权多年，根深蒂固，投身光绪，自身难保；投靠慈禧，可升官发财。

9月20日，袁世凯向光绪皇帝再次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的“忠心”。傍晚，他急忙赶回天津，到总督衙门向荣禄告密，同时策划镇压维新派。当夜，荣禄急忙入京，向慈禧太后报告。次日凌晨，慈禧太后决定发动政变。经过周密布置，立即回宫，命太监收了光绪帝的玺绶，随即将光绪幽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重新宣布“训政”。同时下令搜捕维新派。杀气腾腾地要杀尽维新派，剿灭维新变法的思想。

在政变前一天，康有为按照光绪皇帝的旨意离京赴沪，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则在政变当天躲入日本公使馆，后在日本人的掩护下，乔装出京，由天津逃往日本。从6月11日至9月21日，为时103天的“新政”便宣告终结。

六、为变法而死，死得其所

1898年9月21日，政变发生后的当天中午，谭嗣同正在自己的寓所里同梁启超商议对策。二人对坐床上，苦心焦虑。忽然有人报告朝廷派人来南海会馆搜捕康有为，又听说慈禧宣布垂帘训政，两个人大惊失色，深深地担忧康有为的安危，痛惜维新变法事业惨遭夭折。谭嗣同从容地对梁启超说：“过去我们筹划救皇上，现在已不能救了，今天我们想救康有为也了无办法。我已无事可办，只是等待就义的那一天了！虽然这样，我们知道天下事并非尽如人意，你可以试入日本使馆，谒见伊藤博文，请他致电日本驻上海领事在那儿救护康先生。”

这天晚上，梁启超按照谭嗣同的主意赴日本使馆，而谭嗣同却终日不出门，等待着唐才常率哥老会“健儿”的到来，以求从瀛台救出光绪皇帝。但是，事情正值千钧一发之际，容不得更多地等待，他立即与大刀王五商议劫出光绪皇帝的计划。不料，自从政变发生后，紫禁城外每一处岗哨，就增至20人，往来巡查，日夜不息，而且各土门戒备森严。这样，劫救光绪皇帝的计划不得不放弃。

为了保存维新力量，以图再举，大刀王五苦劝谭嗣同暂作躲避，并愿意做谭嗣同的保镖，护送他出京。但是，谭嗣同坚决不同意。他把心爱的“凤矩”宝剑赠给大刀王五，以作纪念。这时，谭嗣同已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

9月23日，谭嗣同已经知道牺牲在所不免，但他不顾自己的安危，毅然去日本大使馆，劝说在那里避难的梁启超，东赴日本，以待来日。他对梁启超说：“没有暂避时艰的人，便无法寻机再举；没有为事业而牺牲的人，就不能激励后来的人”。之后，谭嗣同和梁启超一同去会见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商讨劫救光绪皇帝的办法，决定由容闳去见美国公使，梁启超去见日本公使，李提摩太去见英国公使，请他们设法保护光绪皇帝。但那时这几个外国公使均不在，因而这一设想又落空了。

在与梁启超告别时，谭嗣同把自己所著的诗文辞稿本数册和一箱家书托咐给梁启超，在生死离别之时，谭嗣同和梁启超紧紧地抱在一起。

从使馆回到寓所，谭嗣同仍与几位志士谋划营救之事，一直到入狱。一天，日本使馆派人来到寓所，提出可以设法保护，让谭嗣同安全出京。来者苦劝，谭嗣同慷慨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9月24日，谭嗣同在寓所——浏阳会馆的“莽苍苍斋”被清政府逮捕。谭嗣同入狱后，被囚禁于刑部监狱。大刀王五为了使谭嗣同少遭狱吏的折磨，专门给狱吏送去钱。谭嗣同在狱中视死如归，慷慨激昂地在囚室中壁上写下了：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他想到汉朝的张俭和杜根不畏权贵，勇敢地劝谏太后归劝皇帝而遭到残害，到处流浪，历尽人间的苦难，可是他们却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死后而流芳千古。谭嗣同感慨变法事业虽然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扼杀，但是改造中国的事业决不会就此而停止，这一次夭折必然唤起更多的志

士为之而奋斗。在反动统治者的屠刀面前，谭嗣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他又想到康有为，并寄望康有为继续承担起维新变法大业，“他的去和我的留，都是肝胆相照，像巍然屹立的昆仑山一样的巨人”。

谭嗣同等维新志士被囚禁后，封建顽固势力更加猖狂。兵部掌印给事中（掌管国家军事力量部门中的官员）高燮（Xi6）曾和福建道监察御史（掌监察百官的官员）黄桂鋆（y*n）上奏，主张早日处决谭嗣同等人。刑部尚书赵舒翹在慈禧太后召见时，恶毒地说：“这些无父无君的禽兽，杀无赦”，是不必讯问的。这些话都说到了慈禧的心坎上，她无不为斩尽杀绝维新志士而后快，但是慈禧太后的残酷屠杀，便预示着这一统治的危机将更快地到来。

9月28日，是北京最暗的一天。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上，临时竖起六根木柱、木柱前绑着六个维新志士。他们是谭嗣同、杨锐、刘先军、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刑场上聚集了很多人。只见谭嗣同正气凛然地对监斩官刚毅喝道：“你过来，我有话讲！”刚毅不敢正视，仓皇示意刽子手，立即行刑。谭嗣同对围观的群众大声说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面对屠刀毫无惧色，英勇就义。

这一年他才33岁。

谭嗣同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国家的强盛，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大刀王五满怀悲哀地为这位志士收敛了尸体。第二年，谭嗣同的骨骸被运回湖南浏阳原籍。在城外石山下建造了志士的陵墓。

戊戌政变后，维新变法运动宣告失败。谭嗣同的家乡——湖南，陈宝箴被革职，新上任的巡抚俞廉三，在慈禧后面亦步亦趋，全部摧毁了湖南新政时期创办经营的各种事业，囚禁、罢黜或放逐支持或赞同维新变法的人，经过血腥的镇压之后，光绪皇帝所颁布的变法措施除京师大学堂和保甲制度被保留下来以外，其他全被取消。

在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封建政治制度，推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开创新式文化教育事业的运动中，谭嗣同是一个核心人物。他的思想闪耀着追求民主政治理想、深刻批判封建的专制制度及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勇往直前无私无畏精神的光辉。他的爱国思想、对传统的批判精神激励着后人为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强盛而执着地奋斗。

